

文化哲学视阈下 档案文化层次问题研究

任 越

(黑龙江大学信息资源管理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摘要]文章以文化哲学中的文化分层理论为理论基础,对档案文化的层次问题展开了探讨,提出了档案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档案文化三层次观点,并指出档案器物文化是档案文化之外在,制度文化是档案文化之维系,观念文化是档案文化之根本的文化关系观点。

[关键词]文化哲学 档案文化 文化层次

[中图分类号]G270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in the stratification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question of archival cultural stratification; put forward the archive material culture, system culture and concept of archives culture three hierarchy view, and point out the cultural relation model: material culture is extrinsic factor, and system culture is the sustain of archival culture, and Ideational Cultures is the foundation of archival culture.

Keywords: Philosophy of culture; Archival culture; Level of culture

文化世界的内涵广度与深度难以把握,无法用自身的感官去全面地把握并认识它,而只能从不同侧面去无限接近。我国漫长的档案事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内涵的档案文化史,其中蕴藏了档案作为社会实践记录与凭证工具的价值评价过程,还包含了档案作为历史事实的载体所表现出的社会历史厚重感与文化情怀。深究我国档案文化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档案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浓缩为一种被人类接受和把握的形式,既有客观实物形式,又包括内嵌于社会主体所遵守的行为规范,还有凝结于主体意识中的价值观念体系。鉴于此,笔者选择从文

化哲学中的文化层次理论入手,通过档案器物、制度与观念三个方面分析档案从作为记录工具层面的文化表征,到其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约束,再到其凝结于社会主体行为模式的过程,进而阐述档案存在的文化价值。

1 档案文化的器物层次

《周礼·秋官·大行人》中有:“三岁壹见,其贡器物。”档案器物是指记录并反映历史的档案载体及其管理工具。档案作为具有物质实体依存的客观物,既不像自然存在物那样毫无社会因素的植入,又不像主体虚在意识那样让人捉摸不透。档案以其实在的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孙关宏,胡雨春,任军锋.政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13.

[2]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3]张照余.档案馆“资治”、“存史”和“文化传承”功能辩证[J].档案学研究,2004(5):7-10.

[4]杨小红.中国档案史[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9.

[5]陆阳.论社会控制视角下的档案制度[J].档案学通讯,2015(4):9-13.

[6]丁华东,余黎菁.论特里·库克的档案记忆思

想[J].档案管理,2014(6):6-9.

[7]黄霄羽.外国档案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66-168.

[8]蒲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81.

[9]陈辉.档案模式文化变迁分析[J].档案学研究,2013(4):4-8.

[10]特里·库克.铭记未来——档案在建构社会记忆中的作用[J].李音,译.档案学通讯,2002(2):74-78.

[11]黄夏基.经济因素影响当代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的有限性[J].山西档案,2007(3):16-19.

[作者简介]张骁勇,男,1993年生,安徽大学管理学院档案学硕士研究生。

客观样态凝结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从文字产生前的结绳、刻契,再到文字产生之后的多元档案载体的进化无一不记录着人类社会在记录载体选择上的良苦用心。

档案文化的器物层次主要表现在档案载体方面。这是因为档案载体不仅是档案工具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更是档案信息内容的承载平台。无论是有形的物质载体,还是人类肉眼或其他感官无法感知的虚拟载体,档案载体自身所呈现的文化性主要表现在其所承载的社会文化特征与科学技术原貌。最早的档案形式可追溯到原始先民的结绳与刻契,在没有文化符号的前提下对物质材料外在形式的再加工并赋予其一定的涵义是档案产生的最直接形式。虽然结绳与刻契因载体与信息内容的相互分离而使其难以被准确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但作为存储信息以备日后之需的行为方式却影响着人类对文字追寻行为的步伐,并开启了人类书写档案文化历史的大幕。直到人类发明了文字并统一为社会实践交流的符号,档案才借助于多样化的载体、可传承和印证的特性呈现出浓浓的文化气息。在我国档案记录载体的演变过程中,无论是甲骨、金属,还是石刻,抑或缣帛、简牍等均体现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体对文字记录载体选择的时代性,而且透过载体及其承载的信息内容能够发现所凝结的社会演进的历史轨迹与文化特征。笔者认为可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深入地阐释:

首先,选用不同的档案载体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社会发展情况与文化水平。档案载体的使用与社会经济、科技与文化发展水平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如造纸术虽然在东汉末年由蔡伦改进之后而使得纸张能够被使用,但纸张的质量和造纸技术水平很难满足流利书写与长久保存的需要,直至东晋末年,纸张才取代简牍和缣帛成为官方指定的正式书写材料;再如缣帛虽然质地柔软且便于书写、携带和保存,但由于封建社会前期手工业水平不高,缣帛造价成本之高使得其很难在社会基层实践中被使用。而随着纸张的使用,用于书写的笔、墨等其他书写工具也相继得到改进,且制作工业水平不断革新,这推动了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发展。与此同时,档案载体的选择也与主体所处的社会地理与人文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即人类会从其生活的环境中去选择那些可以用于文字书写的载体,如公元前2000年,我国夏朝时期开始使用甲骨作为文字记录的载体,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却使用泥板刻写记录,而远在非洲东部的古埃及人使用莎草纸作为书写介质,用于制作泥板的黄泥取自于两河肥沃的河床,而莎草则在埃及大范围的种植。由此可见不同的地理环境与风俗习惯决定了处于不同地域的社会主体选择档案载体的多样化。

其次,档案载体的演变反映了不同时空条件下社会主体对记录载体选择的文化倾向。人类的智力水平是随着人类社会功能的健全与完善、社会实践活动的灵活与多样以及与自然界互动频率增多而逐渐增强的。人类对档案载体的选择也随着人类智力水平与社会需要的变化而逐渐趋于常态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记录便捷性的需求使社会主体对档案载体的需求趋向于便于书写且能够随时取用,因此档案载体从需要刻写的甲骨与金石逐渐过渡到只使用笔书写的简牍、缣帛和纸张。其二,档案携带的便捷性需求使人类不断创造更加轻便的记录载体,简牍虽然便于书写和装订,但用线绳串起的竹片重量沉、体积大且携带不方便,这就使得缣帛和纸张这种便于携带且易于书写的载体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普遍使用的记录载体。其三,档案载体是档案信息内容的承载体,二者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为了长久地保存信息内容,档案载体必须符合长久保存的要求,这一方面需要对档案载体的制作提出较高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档案后期保管条件同样也要满足载体的保管要求。在现代的考古活动中,每当带有文字符号的器物出土时,考古学家总会率先对器物上刻写有文字符号的载体进行分析,并从载体的质地、材料与用途去分析其承载的信息内容,这充分说明档案载体所呈现的不仅仅只是载体本身的外在特征,更多的是隐藏在其载体背后的凝结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轨迹的价值意识与文化特质。

再次,档案载体不仅承载着档案信息内容,更凝结着岁月流逝的痕迹和时代风貌。档案载体所承载的信息内容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档案载体保存时间的长短而出现任何的变化,这正是人类会选择档案作为人类脑外记忆留存工具的原因。但是档案载体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仅仅是档案载体自身的变化而非档案信息内容的变化,但档案载体的变化恰恰为档案产生与留存的社会风貌与历史特质提供了证据,如一份产生于明朝时期的奏折,可以从奏折的尺寸、使用的纸的材质、奏折外边花纹的设计与内衬包装的用料等外在因素分析呈上奏折官员的品级,并可以通过对明朝政府机构所使用的全部奏折样式的比较,推断出明朝不同时期的奏折呈送与官员品级的官场文化关系和政治氛围,而对于现代文件与档案来说,载体的统一使我们很难根据载体来判断档案载体自身所蕴含的文化性,但档案毕竟来源于那些曾经经历过现行使用阶段的各种文书材料,因此现行使用阶段中的部分元素依然可以被选择作为评价档案价值的依据。

2 档案文化的制度层次

所谓制度,泛指以规则或运作模式,规范个体行动的一种社会结构。^[1]这些规则蕴含着社会的价值,

其运行彰显着一个社会的秩序。制度是一种主体目的建构的存在物,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所遵守的价值准则与行为要求。制度的确立意味着秩序的建构,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规范对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每个新的朝代或政权确立之后首先要通过立法的方式来确定和规范社会秩序。档案工作作为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社会分工,在制度的确立与执行上始终保持与各个时代政治思想相一致,并在社会分工多样化的驱动下而呈现出与其他社会行业相区别的职业特质。档案制度的文化层次依据制度的影响力可以分为法律规范、行业准则与工作制度三个层面,其中法律规范是制度的宏观层面,对行业准则与工作制度起到了统领和指导的作用,行业准则则是档案行业区别于其他社会职业的根本,也是档案行业社会存在的价值依据,对档案行业自身的行业规则进行约束与规范;档案工作制度是制度的微观层面,主要用于指导和规范基层档案实践工作。

首先,档案法律规范是档案制度文化层次的最高层次,也是我国档案行业必须要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我国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由于档案与图书、文献、资料等记录物统一管理,直至宋朝之后才呈现出相互区分之势,虽然自唐朝之后,部分国家成文法中开始出现针对文书和档案的相关法律条款,用以规范档案保管的行为,但我国古代档案工作始终缺少一部独立的档案成文法。我国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真正意义的档案成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下称《档案法》)在1988年正式实施。《档案法》是我国档案事业的根本大法,也是我国历史上颁布实施的第一部档案与档案工作的专门法律。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档案工作的相关原则、制度与程序,是对我国档案秩序的宏观设定与规范,并用法律的手段保证其实施。《档案法》的制定充分依据了我国档案工作实际和档案事业发展所处的社会背景,与之相配套的各级各类档案法规和制度构成了我国档案事业未来发展所依据的法律体系。档案法律法规体系的建构既是社会对档案事业社会存在意义的肯定,也是档案事业区别于社会其他事业的根本之所在,一方面通过档案法律法规使我国档案事业更趋法制化、规范化,另一方面突出档案事业在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影响力,用法的形式巩固、推广和提升档案与档案工作在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地位。

其次,档案行业准则是档案从业人员或机构必须要遵守执行的基本专业规则,其为档案从业主体设定了基本的工作原则、理念、方法与内容,它是档案行业区别于其他行业的职业特征。档案行业准则是人类进入到近现代社会,且档案职业作为一项社会独立事业之后,由档案行业从业者探讨研究之后确定的。我国档案行业的基本准则是实行统一领导,

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便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用。这一基本准则不仅揭示出我国档案事业的管理体制,指出我国档案行业秩序的框架结构,并确定了我国档案行业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它是我国档案从业人员在实际档案工作中必须要遵守的基本原则。由于档案行业准则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实施性,因此其往往能够转化为一种行业文化,规范并影响着档案从业人员的工作行为。在现代档案实践活动中,档案行业准则不仅能够约束、规范和指导我国档案实践工作,还能够促成档案从业者的职业素质与操守的养成。虽然“统一领导”的档案工作原则在我国封建历史时期就曾出现过,但那种准则是建立在封建王权、宗法和律法基础之上的片面的集中统一,这与我国当代社会所秉承的价值观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再次,档案工作制度是档案实践工作的操作规则与方法的集合,它是我国基层档案机构根据其所在领域档案与档案工作特点而制定的,并能够准确地揭示档案管理的技能要求、操作规范与技术流程,因此其具有极强的执行性与规范性,是档案行业区别于其他相关行业的具体技术依据。我国宋朝时期提出的架阁库制度可谓我国最早的关于档案工作的专门制度。之前时期出现的档案制度往往被包含在文书工作制度之中,或仅仅是一种缺少明文规定的工作习惯。宋朝架阁库制度一方面使档案脱离图书、文献和资料而被单独管理,另一方面使档案工作逐渐趋于专业化,这奠定了后续朝代档案管理的基本制度。进入民国时期之后,以现代机关档案室为工作重心的档案工作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确定而趋于规范,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档案管理规则或办法,同时借由行政效率运动的文书档案连锁法使得档案工作制度能够广泛地发挥效用。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档案局先后制定了诸如《中国共产党县级机关文书处理工作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关于文书档案保管期限的规定》、《机关档案工作规范》等国家性的档案工作制度,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行业系统都在此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档案工作制度。相较于档案法规和行业准则,档案工作制度涵盖了档案工作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规范,是档案行业立业之根本,发展之依托,其丰富的专业内涵和独特的专业品质决定了其在档案文化层次中的重要性。

如果说档案载体文化层次主要依靠人类所选择的档案的外化载体作为反映文化内涵与价值的话,那么档案制度文化层次则是人类根据档案实践工作需要而建构的原则与规范体系档案自古就被选择作为一种管理工具应用于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之中,档案工具价值的发现与普及一方面是因为档案使用的社会历史传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历朝历代所制定的各种关于档案法律规范和工作制度。虽然

档案信息价值的发现相对较晚,但却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被广泛使用,这主要是依靠相对成熟的法律规范体系。未来档案二元价值论在我国档案行业的推广与普及一方面依靠档案从业者自发的认识、了解和遵守,另一方面则需要档案法律法规内容要涵盖档案二元价值论的精髓,以此保障理论发挥作用的社会实践基础。

3 档案文化的价值观念层次

李德顺教授认为:“价值观念是人们关于基本价值的信念、信仰、理想等的系统,它不同于价值心理、价值意识,这是因为价值观念是比较有自觉意识的,而不是对需要的直觉和直观,它具有某种系统化的,进行社会交流的独特思想形式,其在内容上、形式上都真正成为社会性的意识,它的作用不仅在于个人,更多地在于社会。”^[2]无论是档案器物,还是档案制度规范都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将人的价值意识和文化心理反映在某一客观事物或主体共同遵守的约定的行为表现,而在漫长的人类档案实践活动中逐渐积累而成的价值观念才是档案社会存在的根本动力。人类在不断演进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选择了档案作为其承载与传承历史的工具,围绕档案传承与延续而形成的档案工作使档案完成了从历史记录工具演化为社会历史记忆的价值定位转型,这其中不仅反映了人类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档案价值认知和功能定位的转变,更蕴含了社会主体在把握档案社会存在意义上的飞跃,这种飞跃跨越了社会主体对档案外在形式的层级而深入到主体的价值观念层面。笔者认为,档案价值观念的文化层次根据文化主体的范畴不同可以分为个体档案价值观、国家档案价值观和社会档案价值观,具体表现为:

首先,个体档案价值观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根基。个体档案价值观是社会个体基于档案价值而形成的价值倾向、价值意识与价值心理的集合。^[3]档案文化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要将档案转变为社会主体从事社会实践活动时所依赖的一种常态化行为模式,更要将档案这一工具或思维凝结于主体的观念之中,使之成为主体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常态化价值意识或价值思维。通过价值观念引导主体的行为是社会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根本。对于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来说,能够融入社会主体的观念之中是极其困难的,这是因为人类作为一种依托情感基础进行价值选择的动物,很难根据其丰富的、多元化的情感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观念结构,而主体价值观念一旦形成将会在主体观念结构中保持相当长的时间,甚至会成为主体的一种常态化价值观念。个体档案价值观的养成不仅需要档案机构通过日常的与社会个体互动的提供利用工作中予以实现,更需要其借助多元化的信息传播与服务的手段为社会个体提供全面性的、焦点性和互利性的档案信息宣传

与服务,进而营造一种友好的档案文化氛围。档案的使用源自于社会主体的个体行为,而后被选择作为一种群体管理工具的,也就是说档案价值观念的养成具有较好的历史基础和社会基础,从目前社会主体对档案及档案工作的认知和评价来看,个体档案价值观正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近二十年来我国档案事业全面发展和社会宣传与普及深化的结果。社会档案价值观是建立在个体档案价值观基础之上的,个体档案价值观的稳固与成熟并不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终极目标,建立一种由社会群体广泛参与档案文化实践,并将档案融入其社会生活,形成一种社会群体观念才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奋斗目标。

其次,国家档案价值观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目标。由个体档案价值观向国家档案价值观的跃进是档案事业逐渐成熟的标志,更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核心目标。国家档案价值观并不是若干社会个体档案观的集合,更不是脱离社会意义的政治主张,而是档案和档案工作从个体走向群体,并通过群体影响更多个体的宏观价值观念集合。从档案被人类使用的历史过程来看,正是原始社会时期的符号记录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原始部落的资源分配和事务处理过程,才使得被社会个体所使用的“结绳”、“刻契”等原始记录工具被管理阶层所选择,并融入到整个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层次,档案从一种用于个人记事备忘的工具升级成为国家管理所必备的记录工具和管控工具,进而成为社会主体所接受的信息记录与再现的工具。时至今日,档案作为记录和管控工具的作用依然得以延续,国家档案事业的社会影响力正依靠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管理体制而呈现出逐渐扩大之势。与此同时,由档案信息价值所引发的档案文化也随着档案信息内容的社会广域共享和档案信息服务的日趋完善而彰显出其内在的文化张力。笔者认为国家档案价值观既是一种宏观的社会档案价值观,也是一种引导档案价值观,它在强调档案作为一种国家记忆和社会记忆的工具价值之余,更要强调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的文化张力,依靠档案的文化推动力以保障档案工具价值在社会各个领域的稳步推动。档案价值观念由个体价值观念向国家价值观念的过渡并不是以牺牲个体档案价值观念来满足国家档案价值观念的确立,恰恰是要在培养个体档案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凝练符合普遍社会个体档案价值观念的国家档案价值观念。

再次,社会档案价值观念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延续。价值观念作为价值意识的自觉化、理性化的发达形态,是人类内心深处这种富有激情和动力的精神形式。与国家档案价值观念一样,社会档案价值观念并不是个体档案价值观念的简单集合,而是凝结于某种社会群体间的在档案价值意识和档案行为

从新发现的史料看宋代架阁库

——中国古代档案管理模式研究系列

张全海

(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乞诏州郡置架阁军器库劄子》及同时代相关文献显示,架阁库所在房屋是楼房,库在楼上,办公场所在楼下。“架阁”有架造楼阁之意。徐清叟《六部架阁续题名记》是新发现的第四篇六部架阁题名碑记,朱貔孙《六部架阁续题名记》则是第五篇碑记,它们提供了两位南宋架阁官的姓名——黄叔度和罗京子,并同时强调了六部架阁的“储材”功能。

[关键词]架阁库 徐清叟 朱貔孙

[中图分类号]G279.29

上的统一。^[4]国家档案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主要表现为档案行政管理意志,它不仅是一种档案文化现象,同时也是档案文化体系建构的重要推动力。但是国家档案价值观念毕竟是一种宏观层面的价值观念,其需要以普遍的社会档案价值观为基础,也只有在社会群体间形成一种普遍的档案文化认知机构,并接受这样一种社会文化推力的前提下,档案文化才能在社会群体间生根发芽。由此,笔者认为社会档案价值观念的养成是档案文化体系建设得以延续的根本。社会档案价值观念由多种价值意识组成,其中包括目的意识、规范意识和实践意识。目的意识是指社会主体将档案作为其实现目标的工具,并将档案工具价值凝结于主体的日常社会实践活动中;规范意识是指社会主体将档案融入到社会规范之中用来规范和约束社会主体的实践行为;实践意识是指社会主体形成的档案价值观念转化为自身言行中的过程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深层思维和心理特征。其中目的意识包含了主体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取向,它是档案价值观念影响主体行为的最直接的意识形态,规范意识是主体对生活中与档案相关具体规范的理解和执行,而实践意识则影响着主体的实际行为,实践意识由目的意识和规范意识所主导,因此表现出较强的目的性和多元性。社会档案价值观念形成的建构过程中,要继续发挥档案作为记录载体的社会功用,使之成为主体目的实现的工具,成为影响和规范主体行为的社会规范与准则,同时更要发挥档案信息资源的集成优势,以内涵式建设为依托,对档案信息资源本体采用关系挖掘、资源整合与社会共享等手段,在社会群体层面营造档案文化氛围,以此推动社会主体档案文化观念的养成。

综上所述,档案价值观念的文化层次较前述两种文化层次属于隐形文化层次,这是因为主体对某种客观事物或现象的价值观念不会直接表现在外在事物或某种主体间的约定之中,而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逐渐形成并渗透到主体的社会行为中的。档案一元价值观向二元价值观的转变不仅表现为社会个体在社会文化演进过程中的档案价值观念的转变,更表现为档案价值观由个体向国家,再到社会的渐进式转变路线。由此笔者认为档案价值观念的文化层次是整个档案文化三个层次中处于高级形态的文化层级,这一层次不仅让我们感悟到档案器物形成和档案制度执行的实践根基,更使我们领悟到档案之所以为档案的主体意识来源与价值基础。如果一个人开始认真思考人生是什么时候,那么这个人就已经走到了文化的门前。在领悟到档案器物层次的客观、制度层面的庄严与观念层面的严峻之后,档案二元价值理论所蕴含的文化哲理想必已经水落石出。

注释与参考文献:

- [1]赵景峰.试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嬗变与建构[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3:9.
- [2]李德顺.价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12.
- [3]杨文祥.信息资源价值论——信息文明的价值思考[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48.
- [4]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55.

* 本文为黑龙江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黑龙江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档案文化模式研究”(项目编号:JC2013W3)。